

北京文学  
创作丛书

BEIJING  
WENXUE  
CHUANGZUO  
CONGSHU



杨沫散文选

北京出版社

F267/146-2

743 18

---

# 散 文 选

---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55110



北京出版社

---

855110

丛书设计：王晖  
本书设计：任建辉

·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  
**杨沫散文选**

---

出版：北京出版社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印刷三厂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17,000 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6,500  
书 号：10071•387

---

定 价：0.53 元

# 杨 梓

献给亲爱的读者

先驱者的血，染红了  
小小的笔尖，它燃烧着微  
微的光束，它浇灌出朵朵  
的小花。光束冲破黑暗迎  
向光明；小花披着淡香羞  
涩地笑向人间……

——作者发自肺腑的语言



九月

此地。从那以来的深沉观察中，我又深一步地感到：他何有失去的土地，他何方策的计划，都不会一帆风顺的。要表达的理想，都必然遭遇挫折；因为是经量各种挫折或失败，而后才得逐步成功。一个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国家，要想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是困难无以形容的，重大的改革，这也是不足为怪的。这么一想，我的心情又充满了喜悦和希望，又充满了力量，地充满了斗争的勇气。

## 作者手迹

## 目 录

乡思的朝和暮.....	( 1 )
乡 情.....	( 14 )
花 蕊.....	( 19 )
怀 念.....	( 26 )
青春应当是鲜红的.....	( 31 )
难忘的悠悠岁月.....	( 35 )
白与黑.....	( 40 )
青春呵，永远发出绚烂的光彩吧！ .....	( 53 )
献上一颗炽热的心.....	( 57 )
深埋在心底的思念.....	( 61 )
哀 念.....	( 63 )
碧海青天寄友情.....	( 66 )
伊藤克姐姐，我怀念您.....	( 71 )
一封奇怪的信.....	( 76 )
永不凋谢的玫瑰花环.....	( 78 )
永远难忘的友情.....	( 82 )
天涯若比邻.....	( 88 )

DPH / 19

和聂华苓重逢.....	(93)
小鸟和松鼠.....	(99)
我以是女人而骄傲.....	(103)
致阿拉伯读者.....	(109)
北京的灯光.....	(112)
北京沙滩的红楼.....	(115)
我爱北京.....	(118)
春城无处不飞花.....	(124)
我的生平.....	(127)
大河与浪花.....	(143)
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	(147)
在后方医院.....	(152)
回 忆.....	(156)
罪恶的见证.....	(160)
在兵站上.....	(167)
神秘的大苇塘.....	(172)
郑德富家两口子.....	(176)
永久的忆念.....	(182)
素不相识的大娘.....	(190)
后 记.....	(194)

## 乡思的朝和暮

我父母亲是湖南人。父亲是在清末中过举的。但他思想还灵活，也可以说还先进。康梁变法维新之后，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这时父亲就携带我的母亲和亲哥哥，从湖南到了北京，考进了京师大学堂。以后，毕了业，留在北京办起了据说是我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他的名片上除了××科举、举人的头衔外，还加上一个“京师大学堂大学士”以及大学校长等职称。我生在北京，也长在北京。从孩子时代认得几个字以后，我就有这么个癖好：走到街头，我就探头探脑前后左右观看店铺的名称和对联，什么“德顺老酱坊”啦，什么“又一顺羊肉店”啦，什么“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对联啦，我都兴致勃勃地看着、念着。甚至走过妓院集中的八大胡同里，我这么个十来岁的孩子也要十分好奇地凝神观望：那些油漆鲜艳的小门的上下左右，红红绿绿五颜六色的电灯上写着一个个妓院和妓女的名字——什么“翠玉”、“嫣红”啦，什么“红凤”“醉妃”啦……我也望得挺有趣、挺带劲。在

自家的屋里呢，我抓住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我所能接触到的一切文字不管看懂看不懂我都兴致勃勃地看呀、读呀，把我迷得好快活！所以，父亲的名片，有些年也成了我欣赏中的一宗。他的名片上除了正中写着大名和别号外，右上角则是一排越来越多的官衔，除了“举人”、“大学士”外，又逐渐加上一些他后来担任过的职务名称。左下角则是籍贯乡里——湖南省，湘阴县，再就是北京的住址门牌号数了。

我幼年生活在古老的北京，然而它却时时和遥远的湖南默默地联系在一起。譬如每天听到的声音吧。“老乖子！”“老乖子！”我这个奶名常在母亲的嘴里用湖南平江的口音或高声或低声地呼唤着。“云湘公！云湘公！”母亲也时时用湖南乡音呼唤着相公老爷的父亲。我幼时听到的声音——湖南的多于北京的。于是，当我十七岁前，我的家庭还没有解体的时候，我对父母以及湖南同乡讲得一口湖南话——我管母亲叫“姆妈”，管父亲叫“爹爹”，（音“的的”）管祖母叫“唉驰”。我说的满口湖南话还挺地道呢。

幼年时期引起我对湖南人最亲切、最深挚的感情的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一个是我的年迈慈祥的老祖母；一个是我年轻美丽的嫂嫂；一个是常来我家串门的湖南同乡——留着长发的大学生方伯务。

我父母不和，他们都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儿女。我幼年虽然生活在这个“大学校长”的书香之家里，家中有时还有几个佣人，人们还管我叫着“大小姐”，可是，幼小的我，

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袜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浓血，浑身长满了虱子，成天和街头捡煤渣的孩子一起玩，一起在寒风中满街乱跑。夏天，母亲嫌我麻烦，把我送到舅舅家里去寄养。表兄弟多，他们欺负我没人疼，骑着打我，骂我是“杨老狗”……我的童年是悲惨的，至今想起来都忍不住掉泪。但我也有过幸福温暖的时刻，那就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祖母从湖南来到了北京。她带着我睡觉，给我洗身、换衣；给我吃她的点心、水果；还给我讲了许多许多的故事。她照顾我，关怀我，我仿佛孤儿找到了母亲。可是当我九、十岁时，祖母又回湖南故乡去了，我又成了孤儿。不过这时候，我的哥哥从湖南娶来了一个十分美貌而又贤慧、善良的嫂嫂，她名叫李霞英，年龄不过十八、九岁。她一到北京家中，就暗中悄悄照顾着我：她做鞋给我穿，帮我换洗脏衣服。当我得了痢疾，拉得面黄肌瘦的时候，母亲毫不理会我这个病孩子，我的嫂子就偷偷拿出钱来，托人买药给我吃，治好了我的病。我是那么爱她，从她身上我得到了母亲般的温暖。可是，刚结婚一年多，我的嫂嫂就被产褥热夺去了年轻的生命。苦呵！我曾哭得几天不吃饭，我失魂落魄地想跟着嫂嫂同归泉下。我再没有亲人了！我又变成孤儿了！梦中，我曾多少次看见我那温柔善良的嫂嫂呀！至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在我的心底里仍然可以浮现出一尊明眸皓齿、窈窕可爱的少妇形象来——她坐在我身旁，手里拿着彩色丝线，正在绣着一顶婴儿的小红帽儿。

她喜悦地等待着她未出世的孩子的到来。可是她死了！……她也是湖南人，说着一口动听的柔美的湖南话。那么亲切的湖南话！

在我的记忆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并且在我一生中或许起着重要作用的第三个湖南人，那就是一九二七年和李大钊同志一同被军阀张作霖绞死的共产党员方伯务了。

我已经十二、三岁了。有一阵子，常常有一个蓄着长头发，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的大学生到我们家中来作客。父母亲都还好客，对这个似乎是搞艺术的年轻同乡，接待还殷勤。我们都叫他“方先生”。父母在家，他和大人谈话；父母都不在家的时候，这位方先生就和我谈话，向我打听点什么事。但更多地是他给我讲故事。这个人和蔼可亲、气度不凡，我爱听他讲故事，感到他亲切。有一个晚上，他又来了。那时，我们家已经潦倒了，住在北京西四附近的皇城根。三间北屋，一间被布幔隔成卧室，外面两间就成了客室。小孩子好瞞，听方先生和父母谈了一阵话，我就睡觉去了。等我睡醒一觉，听见外面还有方先生和父母谈话的声音。我心里有点纳闷：“这么晚了，怎么他还没有走呢？”我望见白布幔上有一个巨大的黑影在晃动，还吓了一跳。但很快明白了：这是方先生在屋里来回踱着步，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到墙壁似的幔帐上。接着，我又睡着了，他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但是，没过几天，我这个好读书也爱读报的孩子，忽然在当时的《顺天时报》上发现了

一条令我震动的消息：李大钊等二十个共产党员被捕了。二十个人的名单中就有方伯务的名字！

我仿佛明白了，方伯务那个晚上总不走的原因，是想在我们家中躲避对他的追捕；可能父母没有留他住下，不得已他走了，接着就被捕了。想到这儿，我为这个“大朋友”心里挺难过，挺不安，担着心。

又过了些日子，一天，仍是在《顺天时报》上，我发现了更加令人吃惊的消息：李大钊等二十个被捕的人——其中也有方伯务，被大军阀张作霖下令全部绞死了！

啊，他被绞死了！方伯务被绞死了！他的死，不仅使我幼小的心灵充满悲痛、哀伤；更多的还是惊奇、迷惑——他是好人，不是强盗，他又有学问，又对人和蔼，怎么会被人绞死呢？说他们是什么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不！方伯务是好人！如果他是共产党，那他也决没有去杀人放火！……。

我小时候还有一个癖好：人虽小，却非常爱听大人们讲话。家中客人很多，当我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客人常把我当成哑巴——因为我无论见了什么人，全是愣愣地望着人家的脸一言不发。为此母亲时常叱骂我。可是，也许幼小的心灵惯于孤寂吧？我什么话都不说，却喜欢把小小的身子藏在沙发后面，听大人们讲些什么。家中三教九流、各式各样的客人都有。客人来了，坐在沙发上闲聊天，有的高谈类似《官场现形记》里面的官场见闻；有的谈什么阔人新娶了一位漂亮、厉害的姨太太；有的谈什么人家的大小姐嫁了

一个有权有势的丈夫；有的甚至谈起哪个妓院里的妓女红，如何迷人，如何发了财；也有时谈起当时动乱的政局和物价等等、等等。不管大人谈什么，我都偷偷瑟缩在沙发的角落里，津津有味地几个小时地听下去。大概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后吧，湖南的共产党在搞打土豪、分田地。这时候，经常有一些逃到北京的地主、豪绅之流到我家来。我还是躲在沙发后面听父母和这些人谈些什么。这些人的谈话我还记得——他们大骂共产党，说共产党、乡农会如何抢了他们的财产、土地和房屋；还杀了什么人等等。可是，每当这时，我就忽然想起方伯务来。我口中不说，心里却在悲声高喊、斥责：

“胡说！胡说！共产党是好人。他们哪里会杀人，会抢东西！……”

是的，方伯务生前并没有对我讲过任何有关共产党的话。可是，这个共产党员却以他的生命、鲜血，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涂上了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共产党是好人！

而且，当时我已经读过鲁迅纪念刘和珍的文章。我是那么仰慕着刘和珍这样的人。我不知不觉地倒向反对权贵的那一边去。

人的一生中，幼年——成长期的关键时刻，他们承受外部世界的影响，是异常有力，异常魅人的。我的幼年，从封建地主家庭中看到了那么多肮脏的、丑恶的东西；可是，在这同一个家庭中，我却也继承了父母喜欢读书的嗜好，并从这里得到了了解社会上许多人情世故的益处。而且认识了

方伯务，他更给我以后探求真理——一种想知道共产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强烈欲望，对我以后参加革命、参加党，不知不觉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自从一九三一年母亲去世，在我们和父亲很少来往的情况下，我们的家散了。我和哥哥、妹妹都各自过着独立的生活。从此，和湖南渐渐疏远，我也很少再讲湖南话，终于乡音只能听而不能讲了。然而，在心底里埋下的湖南种子，却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朽烂。每当遇到春天似的气候，它还要萌动，还要竹子般窜到晴朗、明媚的地面上来。

“你是哪里人？”

“我是湖南人。”

多少年来每当有人问到我的籍贯时，我总是这样自豪地告诉对方。每当填写履历表时，尽管我等于从未去过湖南，但在履历表上，我却从来都是填着湖南省、湘阴县。有时还加上村名——东三里。其实呢，湖南对我已经是一块既陌生、又疏远的地方。这地方是个啥模样？我只能想象——它山青青、水绿绿、到处有池塘。人民呢，勤劳朴实、聪明能干……。每当遇到湖南同乡谈起湖南的时候，我心里就浮起这些朦胧的幻影。也就在这时，仿佛一种思念从未见过面的母亲似的乡思，便会悄悄潜入心头。

“这辈子还能到湖南——到家乡、到韶山去看看吗？……”

我一生多半住在北京。除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冀中平原

上打了八年游击，再加上三年多的自卫战争，一共离开北京十二年。一九四九年全国一解放，我又回到北京来。身体多病、工作繁忙，使我多少年来——也就是从幼年直到暮年的最近吧，只有怀念故乡的情感，而无回到故乡的机会。越没有机会，却越加憧憬、渴慕——有时在梦中我会突然看到了波光粼粼的洞庭湖水，它那么碧绿，那么清澈，浩莽莽地荡漾在蓝天白云之下。有时，我仿佛伫立在家乡的汨罗江畔，江水潺潺，山色幽幽，屈原——我生平最景仰的伟大诗人，他忽然拂动着长袖，披散着长发，神态庄严激愤地屹立在涛涛江畔。我也曾几度梦见回到了家乡——东三里。这里有翠竹绕屋，有青山苍郁，有许多陌生却又异常亲切的亲人在向我点头招手。……

梦——湖南总是梦幻般出现在我的意识中。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八日我终于乘上了开往长沙的特快火车。车轮飞速地旋转，我的心也在飞速地旋转。车经河北、河南、湖北等省时，我也不时向车窗外眺望，但那只是一般地看看沿途景色。当车驰过了长江大桥，驰过了武汉三镇，进入了湖南省境后，我的心突然飞快地旋转起来了！我把脸紧贴在玻璃窗上，仿佛看见了远远向我招手的亲人。我凝神注视着车窗外那疾驰而过的每一条小河，每一簇树丛，每一座山丘……看！那河水多么清亮，那树丛多么碧绿，那山丘又是多么艳丽——真的，我从来还没有看见过这般红如玫瑰、艳如橙桔般的山色。多美呀，我的湖南！我的故乡！……

“呵，我终于回到湖南啦！”我俯身在车窗边，脸儿紧贴在车窗上。不知什么时候，几滴泪水已经粘湿了窗上的玻璃。

车厢里的四个卧铺只有我一个人。我可以独自在这间小屋似的车厢中，任凭我的乡情奔泻。我目不转睛地望着车窗外，在十月灿烂的阳光下，我却陷入一片梦幻似的境界中：我知道我正在向湖南——向故乡奔驰；可是，我又有点儿不相信——这真地快到家乡了吗？这不是我又在作梦吗？这种回故乡的梦我已经作过多次了。

当我在长沙火车站上，紧紧握住了前来迎接我的省出版局局长胡真同志的手时，我才蓦地从梦幻中回到了现实，我才清醒地明白我真地来到了湖南——真地回到渴望了整整六十个年头的故乡！

我在湖南只停留了八天。这八天中我到了韶山，到了花明楼，也到了板仓。瞻仰了毛主席、少奇同志、开慧同志的故居。不知怎的，这些共产党员的简单居室，这些八十年代我所看到的真实景物，忽然竟和我幼年时代的大朋友方伯务联系起来，和李大钊同志——这位和方伯务一同被绞死的革命领袖联系起来。幼年的我和暮年的我，仿佛被一条长长的、细细的历史长线串连起来。幼年时，我短发齐眉，天真无邪，对人生充满了幻想，对未来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美好憧憬。后来这憧憬和幻想在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有的实现了，也有的幻灭了。可是这串连在一起的长长的朝线和暮线却没有变。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

共产党员的无畏精神，在我生活的长线上永远闪耀着动人的光彩，永远督促我奋勇前进。写《青春之歌》时，我把这种感受、情感写在里面；写《东方欲晓》时，仍然是这种真挚的情感撼动着我，包围着我。回到故乡，看到故乡出现了那么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视死如归的英雄和领袖，我自豪。然而同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六一年少奇同志回到故乡花明楼，他没有住豪华的宾馆，仍然住在自己家中那低矮阴湿的小屋中，而且住了六、七天。这一观感，也许是我这次去湖南最深的感触——或不如说是对我最大的教育。少奇同志的住室里，只有一张简单的床帐和被褥，那从湖南特有的粗木窗栏里透进来的微弱阳光，却使我陡然感觉满室生辉。甚至那潮湿的阴冷气味也仿佛散发出淡淡的馨香。

我回故乡湘阴（现属汨罗县古岑公社），也是这次返湘的一件大事。我从小到老，作过多少次还乡的梦呀！每当我听到湖南的乡音，每当我想起爱我的祖母、嫂嫂、和引导我认识人生奥秘的方伯务时，我就从心底里对湖南产生一种依恋之情。这次《芙蓉》文学丛刊邀请各地一些作家来湘座谈并参观，我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阴雨霏霏的十月二十二日，我在地、县一些领导同志和湖南出版社几位同志的陪同下，回到家乡的情景，将是我永生难忘的。现在我的案头玻璃板下就放着两张我回家乡时的照片——那么多张陌生的、然而又是异常亲切的头脸簇拥在我的身旁，里里外外——里三层、外三层的乡亲们拥满了公社里